

出离“沉醉西风”之后：1920 年的梁启超

高 瑞 泉

梁任公一行的欧洲之游,从 1918 年末启程,直到 1920 年 3 月回到上海。《清代学术概论》的那些创造性洞见,是承接《欧游心影录》出离“沉醉西风”之后的宣言;《欧游心影录》预见一战之后,世界思潮即将大变。

一旦哲学成为了流行的主题,哲学家就要考虑自己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了。

——[英]彼得·温奇

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宅在家中散漫地读些闲书,断断续续地思考近代中国知识转型问题,自然想到一百年前的梁启超。此公一生波澜跌宕,用胡适的话说,代表了“那个曾经震荡中国知识分子至几十年之久的大运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序言)》)。1920 年梁启超的两部重要著述《欧游心影录》和《清代学术概论》,又很可以代表他晚年思想路径的转向。借此人物个案,我们可以考察近代以来中国人知识生产的方向上的一大转折。

但是,坦白些说,在避疫期间重新翻阅《欧游心影录》,多半始于一点好奇心:他旅欧期间似乎全然没有注意到 1918—1919 年的大流感? 1918 年 1 月,世界仍处于“一战”之中,战争导致了 3800 万人死亡。随着军队的大腾挪,一场大流感(Flu Pandemic)爆发了。“从欧洲到非洲,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印度到挪威,它甚至带来了比战争本身更多的伤亡。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了这种流感病毒。其中 10%—20%的感染者死亡。”(《1918 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按照英国记者凯瑟琳·阿诺德的说法,被称作“西班牙女郎”的流感病毒在一战的最后一年杀死了一亿人!(当然这个数字有点骇人听闻,有的说病死 3000 万,比较折衷的数据是 5000 万)实际上,大流感直至 1920 年 12 月才告结束。正是在 1918 年岁末,梁启超开启了他和朋辈们的欧洲之行,按照欧游的同行者丁文江等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之记录,为了这次旅行,他们已经酝酿了几近一年。如此看来,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真是极为有限,即使像梁启超这样横跨学、政两界的精英人物,对于横扫世界的流感也可谓莫知莫觉,否则何至于在欧洲闹鬼最严重的时刻,一门心思筹钱、结伙赶去疫情的中心? 据说大流感在中国上海、

绍兴乃至唐山等地也曾闹得蛮厉害的,不过后来在中国近代历史叙事中却近于失踪。在治权未能一统的中国,即使贵为中央政府财政总长的梁启超也未及一顾。至于因为中国参战而在欧洲为协约国军队服务的中国劳工染病、死亡的情况,更是泥牛入海一般。今天中国人可以包机将海外学子接回国内躲避时晦的事情,在一百年前借你几个脑袋也梦不到。以此揣度,当初梁启超们是在对今人谈虎色变的大流感几乎无知的情况下,启程赴欧的。此前,他当了短短四个月的财政总长,不但实施币制改革、整顿金融的宏愿完全落空,而且日日挣扎于财政困境之中。深知政治上难有作为的梁任公,“自审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终止政治生涯”。又直觉到“今欧战将终,世界思潮剧变”,故从 1918 年初,即起意出游考察。梁任公一行的欧洲之游,从 1918 年末启程,中间先行到达的欧洲城市是伦敦,以后陆续抵达巴黎和法国其他旧战场,又赴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瑞士、德国诸国,仅仅在六月以后的四个月中,就“坐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以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来复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欧游心影录·楔子》)直到 1920 年 3 月回到上海,总共一年多的时间中,梁启超在欧洲看到了什么呢?

当初发愿去欧洲时,梁启超表白说:“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要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场,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怨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资格。”北洋政府的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才有火烧赵家楼等一系列大事件发生。梁启超等的私

人外事活动自然不再引人注目。所以,《欧游心影录》在后世阅读史上的意义,就主要起于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的观感。——与此前中国外交官如郭嵩焘、薛福成等描述的富庶、整洁、治理有方的欧洲大为不同,梁启超笔下,纯粹是一个破败过气的欧洲。甫到伦敦,梁就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抱怨:“在此镇日间黄雾四塞,日色如血,一种阴郁闭塞之气,殊觉不适。所居虽一等旅馆,每日恒不饱。糖为稀世之珍,吾侪日进苦苳耳。煤极缺,室中苦寒,战后尚尔,战时可想,乃知吾侪在东方,盖日日暴殄天物也。”最触目惊心的就是整个欧洲各国生计与财政破产,“说起这次战争,真算打得一场倾家荡产的大官司。输家不用说是绞尽脂膏,便赢家也自变成枯腊。”梁启超一行虽然不时受到各国东道主的厚待,但是种种不便与困窘在曾经当过北洋政府总长的任公那里(当时北洋政府总长的月俸是 1000 光洋,以至于梁启超面对欧洲人的窘况,会以往日家居生活的“暴殄天物”而自责),自然被放大许多。后来在《大战前后之欧洲》的楔子中,梁启超尽展其文学才华:

到得我来时,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院子里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说,早已萎黄凋谢,连那十几株合抱的大苦栗树,也不过霜威风力,一片片的枯叶,蝉联飘坠,层层对叠,差不多把我们院子变成黄沙荒磧。换有些树上的叶,虽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却都带着一种沉忧凄断之色,向风中战抖抖的作响,诉说他魂惊望绝,到后来索性连枝带梗滚掉下来,像也知道该让自己所占的位置,教后来的好别谋再造。

所有那些在欧游过程中随时记录的情事与观感,到 1920 年回国以后汇集发表,中间不乏欧洲当时的民生凋零、尤其是缺煤少食的窘况,但居然没有片言只语涉及横扫欧美的大流感。否则梁启超对欧洲之惨状又将如何描摹啊!

即使没有大流感的惨剧,梁启超笔下破败的欧

洲,也足以与其出离“沉醉西风”的心态构成情景交融的画面。早在大战结束前一月,梁启超就断言:“今欧战将终,世界思潮剧变。”欧游途中,梁启超屡屡记录西人所说“西洋文明破产”、“等中国文明输进来救西方人”之类的话。起初听见这种话,还当是有心奚落中国人,“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抱着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里的一斑了。”所以书中类似下面的话甚多:

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甚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

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民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实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场大关键。

这些话,曾给予青年梁漱溟极大的灵感,翌年即被用作其著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重要论据。梁漱溟一出道,就发愿只为孔子释迦摩尼说话,并且预言未来的世界文化必定是“东方化”,精神上与“沉醉西风”完全是两路;越两载,梁启超的惊人之语又成为“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的宝典。挑起战端的两造张君勱和丁文江都是追随梁任公欧游的主要人物。张君勱反对“科学决定人生观”论,认为那种纯物质的机械的人生观,把人的精神生活都归

结为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结果就是取消自由意志的宿命论。这层意思,梁任公在《欧游心影录》里早就表白得清清楚楚。

今日读来,《欧游心影录》似乎并无深意,算不上严格的学术著作,但是它的发表,在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却堪称标志性事件。这与一次大战改变世界历史从而改变了中国思想界走向是相应的。而梁任公也从昔日的“以夷变夏”的乱党,转变为正在崛起的“东方文化派”的旗帜,再次证明自己属于马克斯·舍勒所谓“始终是‘数量较少的’个人——主要是发挥领导作用的个人,作为典范而存在的个人以及一些先驱者”(《知识社会学问题》)。由于“精神感染律”的作用,或者有意无意的模仿,他们先是被较多的人追随,接着会被更多的人所追随,因而形成一时之风尚。

1920 年春,从欧洲回国以后,梁启超主要的精力确实转向著述、文化运动和办大学(当时是接手中国公学,主事清华研究院则是 5 年后的事情)。按照《年谱》记载,欧游以前,梁就起手撰写中国通史。不过,1920 年内梁最重要的著述则是《墨经校释》和《清代学术概论》两书。《墨经校释》是近代墨学复兴的一部分;符合梁启超出离“沉醉西风”以后要振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学术的总体意向,但是更有思想史价值的是《清代学术概论》。之所以说此书更有思想史价值,第一,自然是梁启超以亲历者的身份勾画出了清代学术思想演化的大致轮廓。照朱维铮先生的评价,它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著作,“在梁启超的学术著作中堪称佳制。近三百年的学术变化,数以十计的学科概貌,好几百种的专门论著,在合计不过三十二三万字的两本书里,纵横论列,巨细兼顾,头绪清楚,体系粗具,的确证明梁启超的学问见识,都不同于那些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考据家。”